

序（一）

我是在 1998 年暑期到法国巴黎参加国际古汉语研讨会时与本书作者游顺钊先生认识的。由于同是中国人，他为人又极热情诚恳，所以初次见面不仅有他乡遇故人的亲切感，而且相互间还能做知浅言深的交谈。次年，我应时任法国科研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贝罗贝教授的邀请访问该所一个月，期间，跟游先生有多次交谈。我们谈到他 1994 年由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视觉语言学论集》一书。他说那是他 80 年代写的散篇论文的结集，现在很想另写一本《视觉语言学导论》，较系统地介绍自己的视觉语言学理论架构和方法。我对于他在视觉语言学方面的成绩一知半解，就只说了几句鼓励的话，笼统地表示国内语言学界一定会乐观其成的。2008、2009 年间，我应邀两度到巴黎访问时，他把《视觉语言学导论》的《绪言》和头两章的初稿交给我，要我帮他审定。我心想：这真是买书的跑到菜市场——找错门了。不过出于好奇，也不忍心拒绝他的诚意，便一字一句看了起来，可想而知，我只能就这份初稿某些文字上的修订和段落上的调整提出一点皮毛的意见。此后几年，我们各自忙自己的事情，我呢，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忙得不可开交，无暇他顾；他也可能在忙别的事情，没有在电邮里提及《视觉语言学导论》的进展情况。后来他很客气地说，这是“因为没有你的督促，就懒下来，没有继续写下去。”

没有想到，去年八月接到他的来信（电邮），说是“健康出了大乱子。在医院呆了几个星期，刚回家吃药静养。要过些时候才能知道院方下一步的治疗办法。”他接着说：“虽然事出突然，但我首先想到的是，趁着这个静养期，把拖延多年的《视觉语言学导论》尽快写完。若天假以时日，将尽力以赴，希望于年底定稿，寄给你审阅。”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本《视觉语言学概要》，就是他在去年年底动手术前赶写好的。他把原来计划的十六章，删削精简为八章，约十万字；当初书名中的“导论”也改为“概要”——由博返约，内容简括，当得名副其实的“概要”二字。

读到游先生去年八月份那封信我很意外，也很难过，不愿相信那是事实。在生命有难的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留下来，而且要用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既让我心痛又让我生敬。信的最后，他征求沈家焯先生和我的

意见，希望我们为此书作序。说实在的，由于专业上的隔阂，让我作序难度太大了，我只能避重就轻，借这篇序文向各位介绍一下游先生写这本书的种种考虑和我对他的人品的一点了解，希望读者能从我的介绍中了解他的品德和风范，并通过了解他的为人来了解他的为学。至于对本书学术上的评判，自有沈家煊先生来担当。

游先生的法文、英文都很好，但他决定不用法文或英文而用中文撰写这部《概要》（他自小讲粤语，用中文写学术专著并不轻松），这其中是很有深意的。他要把他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和同行，希望能直接帮到国内的同行。同时，他也对国内的语言学界寄以厚望，希望我们能对他的理论做出较客观的评述（参看《概要》第二章末段）。长期以来，他一直非常关注、关心国内语言学的发展，主张中国语言学要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子。早在 1979 年，中国语言学代表团访问法国时，他就对朱德熙先生表示：国内一些同行对美国乔姆斯基生成学派跟风，他对这一倾向持不尽赞同的意见。他认为，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是需要的，但不能亦步亦趋，跟得那么紧。在北美洲，语言学平均 30 年就换一个学派，即或不然，主流学派中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国内同行在北美某个学派接近后期的时候才起步，等到入门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又出现了多个流派，教人一时无所适从。朱先生当时很以为然。其实，游先生这样说，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国外语言学的著述和成就，更不表明他不赞成国内同行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相反，他尽自己的力量积极为国内同行获取国外有关的专业书籍提供帮助。记得 2006 年底，他不怕麻烦和辛劳，把自己多年购得的逾百公斤的国外语言学论著打捆海运，赠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游先生对学术专心致志，丝毫也不热衷于物质上的享受，即使居住在时尚之都的巴黎闹市区，也依然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在巴黎住的是一个四十来平方米的单元房（他称之为“陋室”），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屋内除了有一张双人床外，到处是书架，简直就像一个阅览室。他每日徜徉在这里，过着读书人的生活。他很好客，如果有好友到巴黎做学术访问，他就搬到郊区的一间只有几平米的书室，让出地方，招呼朋友小住。好些有名的学者都在他位于巴黎市中心的“陋室”住过，如朱德熙先生生前曾在那里住过多次，李学勤、裘锡圭、蒋孔阳、桥本万太郎、侯精一、沈家煊等学者也都在那里住过。他们都很欣赏他的藏书，加拿大 UBC

大学高山+岛谦一教授曾对人说，住在游先生家，不用到图书馆去了。他那么好客，家里又有那么多的书，所以她夫人曾提议把对门的单元房买下来，改善一下生活条件。可是他却想，自己当年两手空空来到巴黎，现在两个人竟要占有两套房子，有点过意不去，最终没有接受她的好意。

说起他的夫人，我不得不提及他们夫妇二人对广州聋校在物质上的无私援助和教学上的竭诚帮助。广州聋校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所获得的第一部彩电、复印机、多功能缝纫机、微型放映机、照相机和第一批教学用的英文打字机都是游先生用自己的积蓄购买赠送的。现在，送这些器材也许算不得有多了不起的一回事，但是在 30 多年前国内进口仪器极其贫乏的时期，这些教学器材对于那些聋孩子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无比宝贵。他夫人温晋仪女士 1995 年不幸早逝，留给他一笔 20 万美金的积蓄。为了感谢广州聋校对他历年在手语研究方面的帮助，他把这笔积蓄以每五年五万美元的数额，捐赠给以晋仪女士一家三代女性名字组成的《慧婉仪奖教奖学基金》，迄今已是第四次捐赠了。聋校只提取存在银行里的基金利息来奖励优秀教职工、学生和补助困难学生（聋校方面，每年都把基金运作的情况向他汇报）。据悉，他于 2009—2010 年间，又把晋仪女士所有较贵重的首饰，玉戒、钻戒、钻项链等遗物送给广州聋校义卖，所得钱款也放到基金里去。但学校却希望把这些遗物留下来，将来在新校舍的纪念室里展出。但他坚持把这些首饰义卖，怕放在纪念室会增添学校监管的麻烦。我去参观时，看到校园里立着一块大黄蜡石，上面刻有游先生的亲笔题字：“怀故国，念亲慈，忆晋仪——‘孩子们听不到你微弱的遗言，只知道你给他们带走些苦困’。”（“你”指晋仪）游先生并非富家子弟，这 20 万美金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却不把这些钱用于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捐赠给国内的聋校，这是多么可敬的精神品格啊！他以妻子家三代女性名字作为基金会的名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深情怀念，他让这种感情超越了一般的儿女私情，化作一种高尚的人间大爱。

游先生是一个对祖国同胞深怀爱心的人，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其一是他向盲人伸出援手。他夫人逝世一周年前后，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安徽芜湖盲人教育家席蛮侨突然发病逝世，席先生创办的盲人按摩学校就由他的女儿席蔚菁接手。她因无法还清学校所欠的几万元债务，只好向社会求援。看到这里，游先生

毫不犹疑地把亲友送的致哀慰问金悉数寄到芜湖去。当捐款汇到芜湖盲人按摩学校时，已有香港一个盲人福利机构代她还清了债款。游先生的捐款后来被用于为盲校建盖一座二层楼房，一楼做食堂和浴室，二楼做女生宿舍，该校按他的意思，定名为《三亲楼》。1997年按摩学校扩展后，该楼改用作青年教师的宿舍。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在欧美两地以个人名义向亲友发起“五分钱捐献行动”，两个月间募得捐款近8000欧元。他用汇票寄来托我转交给中国国际红十字会，我遵嘱办了。所谓“五分钱捐献行动”的意思是，不论多少都欢迎，小朋友把零用钱省下来的，几毛钱，几块钱，他都代灾民向他们表示谢意，所以参加他这次赈灾捐赠的亲友人数众多。这固然是因为海外同胞的爱心，然亦可见他平日交游颇广且有良好的人格信誉。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些公益事情总是很低调，在北京的朋友，除了我，几乎无人知晓。游先生自小生活在香港，而立之后一直在海外漂泊，难得他对国家有这么坚执的认同，对同胞有这么深厚的爱心。岁月、距离能改变很多东西，但无论多久、多远，却改变不了他的故国情怀，赤子之心。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自己对游先生治学态度的了解。在专业研究上，游先生很注重通过田野调查工作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他非常珍视与受访者的人际关系，认为这是人文科学领域应该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研究者必须尊重他的采访人，特别是在所谓“落后”的加拿大印第安人保留区和当年贫困的中国农村。采访期间，他以朋友的态度跟他们相处，并常常跟他们同吃同住一两个月。在中国农村调查时，主人家怕居住环境不好，不敢招呼他在家住。他安慰他们说：“没自来水，没电的地方我都能适应，你们放心吧。”在调查酬劳方面，他从不因人、因地而别，不管聋人的生活水平多低，也不管是国外国内，他都按大城市的标准同样支付，一视同仁。例如他给广州黄埔农村聋人的酬劳标准跟香港的调查对象一样。他这样做，并非故作姿态，因为他知道一个理想的调查对象对于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要找的调查对象，犹如大海捞针，很不好找，不像找一个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发音人相对容易些。当年，他找遍了加拿大北部从西岸到东岸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理想的离群聋人。在中国也不容易，从北京到广州，才找到黄埔那个聋人家庭。虽然这些聋人并不知道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但是游先生心里明白，

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研究成果。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他的调查对象。他的这一态度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调查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那个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教士，事后曾坦率地跟他解释，为什么不马上告诉他那位离群聋人的线索，那是要观察一下，他是否和别的田野调查员一样，到保留区来把原住民当豚鼠一样做试验品。在《概要》第一章的篇首语里，游先生写道：“十年的田野调查能有所收获，三分靠执着，七分是际遇。”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肺腑之言。但我觉得他所说的“际遇”，其实是来自他对别人的尊重和体谅。他是个性情中人，谁帮助过他，他都不会忘记，这是他人缘好、人脉广的奥秘。

最后让我转述他撰写法国国家博士论文的一个小插曲作为结尾。在这篇博士论文的首章，他以长达三万字的篇幅详述他在中加两地调查离群聋人独创手语的历程。据说他的论文导师曾反对他写这一章，但他据理力争，认为语言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那么调查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应是整个研究的重要一环。在争论中，游先生暗示，如果不写这一章，他就觉得继续写下去也没什么意思，言下之意，他不惜放弃这个博士学位。后来在论文答辩会上，六位委员都一致觉得这一章写得很有意思，连反对写这章的那位导师，也改变了态度。这个插曲，很能表现顺钊先生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做学问跟名利无涉，这也是很让我敬佩的一点。

江蓝生

2013年3月20日于北京